

财会学资料

(中国会计学会年会资料选编)

第九輯

江西省冶金会计学会

江西省冶金厅财会班

一九八一年二月

编者按：

本辑选编的经济工作有关文章，是从各内部经济刊物上辑录的，对我们理解中央确定的实行进一步调整的战略方针会有很大教益。

选编本辑各文，是给财会班举办的财务科长学习班学习经济理论时参考用，也可供冶金系统各厂、矿领导和会计师、统计师、经济师学习参考。

本辑资料，系内部材料，应注意妥善保管。

目 录

(一) 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	薄一波	(1)
(二) 关于制定长期计划的一些初步认识·····	姚依林	(20)
(三) 今后一、二十年的经济展望·····	薛暮桥	(45)
(四) 我国国民经济的变革与经验·····	许涤新	(60)
(五) 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	中国社会科学院	(76)
(六) 对我国未来十年经济发展前景的预测 (摘要) ·····	经济问题研究资料	(81)

三十年来经济建设的回顾

——薄一波同志四月十一日在军事学院的报告(摘录)

这三十年经济的发展，大致经过四次转折和四个阶段，如果加上现在正在进行的把全党工作着重点转移到四个现代化上来，就是五次转折。三十年五次转折，四个发展阶段。

(1)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成功，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党的工作重点由乡村转到城市，由革命战争转到经济建设，这是一次伟大的转折，是我国革命发展史上重大的里程碑。从经济发展来说，这是第一次转折。

从这时开始的三年恢复(五〇年、五一年、五二年)和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这是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内我们做了不少事情。实际上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医治了多年的战争创伤，制止了通货膨胀，取得了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当时，在党中央、毛主席的领导下，陈云同志主持财经工作。毛主席对这一段的财政经济工作有过很高的评价。记得一九五二年，有一次我向毛主席汇报，谈到我们的经济恢复工作已经完成。毛主席听了很高兴，他说：陈云同志很能干，在延安时候还没有完全看出来。毛主席一边称赞陈云同志有“理财治国”的才能，一边写了一个“能”字，我这里特别的提一下陈云同志，跟下边讲的问题

有联系。

经过三年恢复时期，很快就开始了第一个五年计划。从一九五三年、一九五四年开始(五年计划是从五三年提出来的，但计划是五四年制订出来的)，以苏联援建的一百五十六项工程为中心，开展了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五年计划，只用了四年就完成了。我在这里要着重地说一句，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在党中央的直接领导下，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恩来同志他们都是直接听取汇报的，由陈云同志、李富春同志搞出来的。我还要补充说一句，斯大林在这个时候帮助了我们。他曾经下令，要苏联的计委和一些实际工作部门帮助中国作出一个比较好的五年计划，能够有综合平衡的五年计划。赫鲁晓夫反斯大林，我们总还是称赞斯大林的。斯大林对中国革命讲了许多正确的话。大家还记得，在大革命的紧要关头，一九二六年十一月，斯大林提出了：“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斯大林对中国革命有过很大的帮助，是有贡献的。所以，我们讲党的历史，回顾经济建设的历史的时候，应该想到斯大林。第一个五年计划，在斯大林的帮助下，经过我们自己的努力，是安排得比较好的，是经过综合平衡的。那时有一个口号叫“优先发展重工业”。对优先发展重工业，在理解上执行上都是比较正确的。当时我们考虑到，如果没有重工业的优先发展，农业、轻工业、交通运输业、国防建设就得不到最低限度的装备和原材料，就发展不起来，我们就会患“软骨症”，没有骨头。在实际执行中间，我们部署了钢铁工业，同时部署了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机械制造工业，特别注意了煤炭、电

力、石油、运输的平衡，也部署了燃料动力工业，那时和重工业部平行的，还专门设置了一个燃料工业部，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那时也很注意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比较注意农轻重的协调发展，在基本建设上，比较注意了“骨头”和“肉”的关系。当时能够搞出这个计划是很了不起的事情。因为现在还搞不出这样的计划嘛！有人说，那时经验不多，怎么还能搞出那样一个好计划呢？这件事情值得好好想一想。如果说原因，就是当时是根据毛泽东思想办事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特别注意了综合平衡。三年恢复了经济，随后又顺利地实现了社会主义的三大改造，用不到四年的功夫就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经济建设速度很快，人民的生活水平逐渐上升，社会风气也好。现在许多人都怀念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说那时候好。当然，也不能说那时一切都搞得很好。这是第一个阶段。大家脑子里有这么一个七年的概念。记住这个概念有好处，这不只对研究经济问题，也可能对研究政治问题，对研究毛泽东思想问题，都有帮助。现在我们不是对老人家有所批评吗？大体上看起来，从四九年到五七年我们老人家还是正确的。现在大家说毛泽东思想怎么怎么了，我看大家都不要动摇。在座的同志还可以回忆回忆，那时都是很好的。

（2）一九五六，我国的国民经济发展开始了第二次转折。这里说明一下，我讲的这个“转折”，是按照我们历史走过的脚印来说的，三十年是这样走的，咱就这样说；我们通常讲“伟大的转折”，斯大林在苏德战争时讲过伟大的转折，这里不是从那个意义上讲的。我讲的转折，是从实际上看它是一个转折，但不一定是伟大的转折。经济发展的第二

次转折，情况比较复杂。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现在看来，这是个关键时刻。一九五六年初，毛主席着重提出了我们要找出合乎我国具体情况的经济发 展道路，使我们的经济建设搞得多一些，快一些，好一些，省一些。有名的“多快好省”就是这时开始提出来的。这一年的春天，刘少奇同志找了工业、交通等各部门的负责同志汇报工作，进行座谈。最早找的是轻工业部门和经委的负责人座谈、汇报，研究我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少奇同志提出许多意见，如轻工业与重工业的关系问题提出来了，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关系也提出来了。在工业生产建设方面，战时与平时的关系也提出来了。这时候，我有一次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说到，现在少奇同志在那里主持一些工业部门的同志汇报。毛主席说，这个好啊！你也给我组织一下，我也要听一听。主席很着急，很愿意听。从此，毛主席在二、三个月之内，亲自听了工业、农业、交通运输、财政等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当时，毛主席的工作很紧张，他自己说，一天就是床上地下，起床就听汇报，听了汇报就上床休息，毛主席认为这些汇报很好，这是一次重要的调查研究，边汇报边研究，总结了经济建设经验教训，反对了教条主义，反对了我们学习苏联经验中硬搬不适合中国情况的东西，明确了适合我国情况的经济发展的指导方针。听汇报之后，毛主席就作了著名的《论十大关系》的报告。首先是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报告，其次是在最高国务会议上报告。直到现在，这个报告还是对我们的工作起着重大的指导作用的文献。

那时候，在我们的中央，毛主席、刘少奇同志、周总理、陈云同志，都是亲自出马，最后由毛主席总其大成。从这个

历史过程中，就可以了解到毛泽东思想是集中了全党和革命人民，集中了党中央领导同志的智慧。毛主席生前也一再说过，他的书不是他一个人写出来的。可是过去往往以为毛泽东思想就是毛泽东同志个人的杰出的思想。过去不是常说伟大的领袖就是毛泽东吗？这个概念现在清楚了，列宁在《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那本书中讲过，领袖是一个集体的概念，不是专指某一个人。列宁所用的“领袖”一词，就是个多数，复数，他这个“领袖”从来就是指多数人的，不是指某一个人的。当然，在我们党的领袖中，毛泽东同志是最杰出的，是他把大家的思想集中起来，综合起来，所以不叫刘少奇思想，不叫周恩来思想，而是叫毛泽东思想。从三十四个部门的汇报一直到《论十大关系》，从经济工作上也看出毛泽东思想是集体智慧的结晶。

一九五六年八、九月间，召开了“八大”，确定以后党的任务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把党的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我希望今天在座的同志在研究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把“八大”文件翻出来，看看上边的提法有什么问题？我认为，今天看来，刘少奇代表中央作的“八大”政治报告，，仍然是很正确的，很重要的文件。现在，党的五中全会已经明确恢复刘少奇同志的名誉。三顶帽子根本不能成立，完全是强加的。少奇同志是一个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一生，是个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一生。“八大”的报告提出党的工作着重点的转移问题，提出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生产力的矛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取得了基本胜利，生产关系已经改变了，成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我们现在要着重发展社会主义的

生产力，这是个革命。陈伯达，康生反对，说这是“唯生产力论”。什么叫“唯生产力论”？我这里不多做介绍了，本来是第二国际时批评伯恩斯坦的一句话，伯恩斯坦认为，生产力没有发展到一定的高度就不能进行革命，所以列宁就批评他这种谬论。陈伯达、康生把这些东西拿出来，作为批评刘少奇同志的论据，把刘少奇同志集中全党的智慧提出的这个观点打“垮”了。这不只是个理论问题，我在这里是要提醒大家注意。从这以后，我们党就倒霉、受害了。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还通过了周总理主持编制的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草案。这个草案，后来没有组织实行，被放在一边了。但这个计划是比较好的。一九六〇年毛主席在《十年总结》里面，还专门讲了一九五六年同志的第二个五年计划，大部分指标，如钢等，给我们留了三年的余地，多么好啊！一九五六年，正式概括出“多快好省”的口号，后来发展成为“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九五七年，毛主席发表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的问题》。这次转折到此为止。在这次转折中，出发点是想寻找适合中国情况的经济建设道路的。一九五六、一九五七年两年，我国的经济建设发展是正常的、健康的。对这两年的工作，直到今天大家都没有意见，不仅没有意见，相反还认为相当好，是真正按毛泽东思想办事的。我们大家怀念这八年，就是因为这几年我们经济建设的总的方面是较好的。

但是，到了一九五七年后半年就出问题了。大概是在十一月莫斯科会议上，我们提出了一个口号，叫做十五年或者更多一点时间。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那时苏联的口号是在多少年赶上美国，毛主席在那儿就提出，我

们就找一个英国吧。在具体指标上，是赶上英国钢产量的最高水平，要达到二千三百万吨（当时英国的钢产量）。实际上，从这个时候起，我们国家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就转到“以钢为纲”上来了。在钢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在这个问题上，我也应该作自我批评，军队的同志不知道，在这个问题上我多次作过自我批评。一九五六年，毛主席亲自主持搞了个农业工作设想的“十七条”，后来发展成农业工作的“四十条”。我当时主管工业交通工作。一九五八年六、七月间，毛主席对我说：现在农业已经有办法了，办法就是“以粮为纲，全面发展”。“以粮为纲”，带动其它，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你工业怎么办？我没有很好思索，马上就说：那工业就是“以钢为纲”，带动一切吧。毛主席说，对，就按照这个办，今天看来，这个口号不对头，至少是不妥当，我有责任。实际上，“以钢为纲”并没有带动一切，也不能带动一切；相反还挤了轻工业、农业，也挤了煤、电、油，也挤了运输、铁道、水运、港口，还挤了其它，城市建设呀，宿舍呀，也挤掉了。经济工作的指导思想，从此就转到“以钢为纲”上来了。一九五七年，我国钢产量已达到五百三十五万吨，比一九五二年的一百三十五万吨增加了三倍，平均每年增长百分之三十一一点七。这应该说是很大的成绩了。当时的冶金部长是王鹤寿同志，毛主席说他的工作是有成绩的。到了一九五七年下半年，那时我主持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管工业、交通，兼管年度计划。编计划时，毛主席就提出，能不能再快一点？一九五八年钢的指标原来定为六百二十万吨，比上一年增加八十五万吨，增长速度可以说是相当快了。我算了一下，从五百

三十五万吨到六百二十万吨，速度也是百分之二十好几，如果按这个速度前进，中间没有大的波折，大体上到一九六六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开始的时候，我国的钢产量可以达二千万吨左右，可以实现莫斯科会议上提出的十五年左右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方面赶上英国的目标。这里应当提到，一九五七年我们党内发生了冒进和反冒进的争论。同志们记得那时出现了个“马鞍行”，就是说一九五六年是高的，一九五七年就低下来了，现在要把它高上去，就是高、低、高这么一个过程。为什么低了？说是“右倾”了。这个“右倾”我打了个引号。那时说××同志反冒进了，说××同志就是说周总理，说他反冒进了，这就搞了一个反反冒进。这样就发生了反冒进和反反冒进的斗争。到一九五八年一月，在南宁会议上，大批反冒进。当时提出的有些口号，背离了上面所说的第二次转折开始时所提出的正确原则。总的来说，第二次转折，原本是寻求经济建设的自己的道路，愿望是好的：从一九五六年到一九五七年，实际上是循序渐进，大有可为，是马克思主义的。但是，到一九五八年再加劲，再加油，就糟糕了，这就造成了以后一个期间在工作上的很大被动。正如列宁所讲的，真理超过一步，就变成谬误。这是第二次转折。我讲的是经济，政治上你们参照叶帅的讲话去理解。

从一九五八年开始的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期，包括大跃进、三年困难，这大体上可以算作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二个阶段。这个阶段是在不那么正常的状态中开始的。南宁会议以后，“反右倾”一浪高过一浪，似乎指标高，“快”，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量力而行的指标，“慢”，就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在一九五八年三、四月

召开的成都会议上，提出“拔白旗、插红旗”，指标比较稳当，“慢”的就是白旗，要拔掉。会议特别提出促进派和促退派的问题，会后，又提出反对“稳妥派”，顺便说一句，南宁会议和成都会议的一系列决议，我当时是没有任何怀疑的。一九五八年四月，有一位同志到中南海游泳池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毛主席问钢产量能不能再翻一番啦？这个同志说，行！这样钢产量就不是六百二十万吨，而要达到一千零七十万吨。五月，在八届五中全会上，继续反右。后来，在北戴河会议上，决定组织人民公社，当年要搞到七千亿斤粮。（我附带说一下，一九五八年提出要把钢铁翻一番，一千零七十万吨，粮食要达到七千亿斤，一九七九年我们的粮食产量不错，才六千四百亿斤，五八年到七八年，二十年了，我们的粮食还没达到七千亿斤。）还正式把“以钢为纲”，“一〇七〇”写到公报上，七千亿斤粮食也写在公报上了。把“一〇七〇”写在公报上，我有责任。对“一〇七〇”，我本来是有怀疑的，但大家都说那样干行。后来，我计算了一下，也觉得行，一千零七十万吨可以实现。于是，我就把大钢铁厂的党委书记都叫来，带着他们到毛主席那儿去开会，大家去了一谈，都说行。毛主席也很高兴。地方上有几个同志也非常赞成。我在这里又犯了一个错误，我说要翻一番，必须书记挂帅，全党动员，大抓钢铁。我向主席建议，把“一〇七〇”写在北戴河公报上，我出了这么个坏主意。那时，我认为好主意，是想让大家都能完成任务。是我用电话通知负责起草公报的乔木同志的，说毛主席同意写在公报上。我的意思是，大家都这样主张，就得大家负责任。事实证明，我这个建议是错误的。一九五九年在庐山会

议上批判彭德怀同志的时候，毛主席头一句话就讲，我犯了一个错误，接受了簿一波同志的建议，把“一〇七〇”写在公报上了。当时，毛主席对“一〇七〇”是有过怀疑的。他引用了一句诗：“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因为已经到了九月份了，那时钢产量完成的还不到“一〇七〇”的三分之一，到年底还不到四个月，还有三分之二的任务能完成吗？但还是下了决心，定了纪律，保证实现。于是全国动员起来，大炼钢铁，六千万人上山，全国各地地方都动员起来大办钢铁。

那时，我们的经济工作发生了许多不正常的现象，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等等，许多唯心主义东西泛滥起来了。一句话，违反了客观经济规律。有些是说大话，比如“吃饭不要钱”，这个口号，是上海柯庆施提出来的，他说：饭有的是，不吃掉怎么行呢？当时，甘肃的省委书记告诉我，有些人执行这个东西很积极，看到一个过路人走过去了，走了多远还把他拉回来，说天这么晚了还不吃饭？非叫他吃饭，不吃不行。还有“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唯心主义到了什么程度啊！，还有大破“资产阶级法权”，这是张春桥替柯庆施写的文章（肖克同志插话：柯庆施的那篇文章叫《乘风破浪》，在《人民日报》大版登出来）。从工业、交通战线上来说，原来提十五年或更多一点时间赶上英国的口号，不久就改为十五年或者更少一点时间，过几天又改为十二年，再过几天又改为十年，后来，索性说，只要大家努力，一两年就赶上了。一九五九年、一九六〇年，钢的指标总想搞到两千万吨，其原因就在这里。那时，党内党外生活都非常紧张。我记得一九五九年冬天，毛主席在十二月二十五日找我们这些人谈话、吃饭。

参加的人有陈云、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和我。陈云同志站起来，拿个小纸条对毛主席说，我这些意见还没对其他人讲过，明年钢的产量一千八百万吨，对外发表一千六百万吨，订的低点，争取超过比较好。（那时，订的钢的指标是两千万吨。）毛主席说：我提出三面红旗——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是否正确？还需要经过若干年的实践检验，才能证明。说这句话以后就吃饭。陈云同志的这个意见是很有见识的，是勇敢的建议，而实际上，他的这个意见并没有被接受，有的人还指责为“右倾”。后来，陈云同志还为此在一次会上作了检讨。

南宁会议以后，一下子就把风吹上去了，吹到了极端，“左”了，“左”得很。但是，应当正确地、公道地讲，是毛主席首先提出要纠正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的。纠正的时候也是非常紧迫的，会议一个接一个。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开始纠正，十一月初，开第一次郑州会议，集合了若干省、市委书记和中央有关部门的负责人，开始解决这类问题。在这次会议上，毛主席着重讲了有关发展商品生产和利用价值规律问题，提出了读两本书的建议，一本是斯大林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本是《马恩列斯论共产主义社会》。十一月下半月，召开武昌会议，也是解决这类问题。毛主席说，“一〇七〇”是个冒险的计划，六千万人上山，别的都让路，搞得很紧张，主张把一九五九年钢的指标降下来，把计划放在可靠的基础上。还讲到要用四个月到半年整顿人民公社。一九五九年二月开了第二次郑州会议，着重解决人民公社的所有制，按劳分配和“一平二调三收款”的问题。一九五九年四月开上海会议，着重议论了多谋善断、留有余地、实事求是和波浪式前进的问题，反对少谋武断、

脑子僵化、计划留缺口和天天搞高潮。那时，我记得毛主席拿出一本《三国志》说，那里有一个郭嘉传，郭嘉是曹操的一个很好的谋臣，多谋善断。还提出了解放思想，坚持真理。上海会议后，中央指定陈云同志调整一九五九年钢的生产指标。陈云同志花了三个月的时间，把钢产量定为一千三百五十万吨。执行的结果证明，这是切合实际的。总之，这个期间开的会，都是类似性质的工作会议，直到六月上庐山，都是在党内干部中纠正冒进的错误。这是毛主席亲自主持纠正这种“左”的错误。毛主席对一些主持财经工作的同志讲，现在不能再支持你们了；还说，过去大家反对我的“冒进”，现在我反对大家的冒进。提出要“压缩空气”，劳逸结合，冲天干劲要和科学态度相结合。我记得在武昌会议上，毛主席还讲过真老虎、纸老虎的问题。说我们现在遇到的是真老虎、铁老虎，啃不下，指标高啃不下来，毛主席很注意纠“左”的方法，反复讲“气可鼓而不可泄”，要保护群众和干部的干劲，强调公开反冒进是不对的，那是泼冷水、泄气，“人而无气，不知其可也”。这是毛主席的话。一方面是鼓气，一方面又要把高指标、瞎指挥、共产风反掉。经过一系列的会议，从一九五八年十一月到一九五九年六月，有八个月之久，空气有点压缩了。但是那些劲头特别大的人并不服气，思想上是否有所触动，很难说。

一九五九年六月下旬，庐山会议开始了。会议前半个月，开的是“神仙会”，继续“压缩空气”。毛主席检查了一年半来，许多政策执行的结果，成了“一条腿”。还指出：大跃进的重要教训之一，是没有搞平衡，在整个经济工作中，平衡是个根本问题。特别提到，是否要把重、轻、农

的次序反过来，提衣、轻、重。还讲，过去陈云同志提过首先安排好生产，安排好市场，其次再安排基本建设。现在看来，陈云同志的意见是对的。要把衣、食、住、用、行这五个字安排好，这是六亿五千万人民安定不安定的问题。前半个月，会议开得很好。但是起草公报的时候，发生了不同看法。有些人不那么服气，说公报草案没有表现出轰轰烈烈大搞钢铁的群众运动的面貌，没有明确提出尽快赶上英国的口号，对形势估计右倾。于是引起了争论。就在这一个时候，七月十四日，彭德怀同志提出了有名的《意见书》。从实际内容来看，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并没有错误，里面讲的许多问题，也并不新鲜，与第一次郑州会议到庐山会议前半段议论的内容没有什么差别，只不过是把这个时期讲的内容肯定了一下，多了一点分析，加了一个政治评语：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毛主席讲了“气可鼓而不可泄”，而他讲了“小资产阶级狂热性”。这句话激起了提倡吃饭不要钱和反对按劳分配及反对资产阶级法权的人站起来反对。说这不是“气可鼓而不可泄”。这样一来，就引起了一场风波。

庐山会议的后半段，从工作会议转到开八届八中全会。毛主席在八月二日讲了话。着重讲了路线究竟对不对？于是，会议的方向转了，气氛也就改变了。而且不只是就意见书讲意见书，不谈经济问题，转到专门谈政治问题，还联系到历史上的问题。各方面一摆，大家的情绪就来了。所谓“大家情绪”这个提法不科学，反正是情绪吧。结果，把反“左”的成果弃之于一旦，同时由反“左”转向反右，一直攻右呀！这次反右倾比南宁会议之后，一九五八年开头的那次更厉害。这一反，引起了一些同志，有在中央的、也有在

地方的、应该说也有在军队的，都起来攻了，攻这个右倾了。结果，一九五八年搞高的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共产风，似乎又完全都是正确的，甚至认为搞的还不够。全国开展反右倾斗争，这一家伙搞得更紧张了，闹了大半年（肖克同志插话：你刚才讲为什么大家都来攻呢？因为八月二号那个调子定下来了；目前是右倾机会主义有组织地、有计划地、有步骤地反对党的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猖狂进攻的时候，因为有那个调子，所以大家才都来攻！），我从庐山下来以后就作检讨。因为我上庐山之前，作过几次报告，说大跃进比例失调了，被人抓住了。上庐山的时候，我也准备了点材料，是叫薛暮桥同志给写的，我授意。薛不敢写，我说，是我叫你写的，怕什么？因薛和我的看法一样，写得挺好。我是在庐山会议后半段去的，到了庐山一看，气候变了，有材料也不能拿出来了。我这个人风格不高，就没敢拿出来。文化大革命批我时，说簿一波是漏掉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你在庐山准备的材料不敢拿，是胆小鬼。确实有那么回事，那时，我的帽子很多，什么“走资派”、“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等。还硬要我说是薛暮桥写的。薛挨斗，说是一波的，我就写了证明，说是我的，这才了事，不再斗薛暮桥同志了。

庐山会议以后，不久，又来了一个赫鲁晓夫撤走专家，撕毁合同。这件事，激起了大家的义愤，说你赫鲁晓夫欺负我们，你撤走专家，我也能干，比你的专家在的时候干得更好。钢，什么一千八百万吨，非搞二千万吨不可，炼“争气钢”，说是给毛主席争气。什么唯物辩证法，客观经济规律，统统不要了。从一九五八年十月到一九五九年七月压缩